

看见彼此， 裴淳华的戏剧张力与中英文化共鸣

◆ 黄丽珈



当拥有中文名的裴淳华放下国际影星的光环，在外滩的屋顶露台给观众们送祝福，在上海街头与大家拍自拍时；当她随英国首相斯塔默访华，在中英文化交流中俯身倾听中国艺术的脉动时，她正以最真诚的姿态践行“看见”的艺术——如同其主演的戏剧《非穷尽列举》中试图直面自我的杰西卡。她在努力看见中国文化的肌理，中国观众亦透过她的表演看见西方女性议题的深邃思考。这场双向的凝视，恰恰印证了文化交流的本质：唯有主动共情，方能让不同文明的碰撞变得温柔而深刻。

2026年初，裴淳华陪同英国首相斯塔默访沪的新闻和短视频片段，让这位深爱中国文化、推动家庭融入中国文化的国际演员，从艺术领域走进更广阔的社会视野，在其主演的戏剧《非穷尽列举》在沪放映后，她参加此剧首次映后谈，也为这场跨文化对话提供了鲜活的艺术注脚。如她在映后对话时坦言，自己阔别舞台14年后接演杰西卡这个角色，正是被“母职身份和职业角色的艰难平衡几乎是所有女性都会遇到的共同话题”而吸引。

作为手握金球奖的实力派演员，裴淳华的演艺生涯本身就是一个跨文化的叙事范本。牛津大学毕业，在商业大片与文艺作品间自如切换，从演出《007之择日而亡》中史上最年轻的牛津“邦女郎”一举成名，到《傲慢与偏见》中温婉知性的简·贝内特打破类型化标签，再到《消失的爱人》中多层次的表演斩获奥斯卡最佳女主角提名，她用近三十年的演艺实践证明她作为演员的可塑性与艺术生命力。在《消失的爱人》中，她塑造的艾米将女性的复杂与婚姻困境演绎得入木三分。全球3.56亿美元的票房与多项国际大奖的肯定，不仅让她跻身好莱坞一线，更让中国观众记住了这位兼具美貌与实力的英国演员。此后，《私人战争》中坚毅果敢的战地记者玛丽·科尔文、《我很在乎》中犀利腹黑的玛拉，以及《时光之轮》中气场强大的沐瑞，每一个角色都展现出她对女性多元处境的深刻理解，而这种对人性深度的挖掘，也为她日后出演《非穷尽列举》奠定了坚实的艺术基础。

2026年访沪期间，裴淳华的双重身份引发广泛关注：既是陪同首相参与外交活动的文化使者，也是带来戏剧作品的表演者。她的中文名“裴淳华”，暗藏着跨文化的巧思——“裴”谐音英文姓氏Pike，“淳”寄寓坦率正直的品性，“华”既指代中国，又呼应英文名“Rosamund”(玫瑰)的意象。她笑称在伦敦街头听到有人喊“裴淳华”会下意识转身，这份对中文名字的认同，早已超越符号层面，成为她融入中国文化的鲜活见证。更令人动容的是她的家庭文化实践：长子尤子君夺得“汉语桥”全球总冠军，次子获最佳口才奖，孩子们甚至反过来成为她的中文老师，让跨文化交流从个人选择延伸为家庭传统。在外交场合引用“习武之旨，在于止戈”，推崇“白头偕老”的情感理念，裴淳华用真诚的文化认同，为严肃的外交互动注入了情感温度，成为中英民间交流的一座桥梁。

如果说文化交流是裴淳华的外在标签，那么《非穷尽列举》则是她艺术内核的深度呈现，这部备受评论界关注的戏剧作品，以极致的人性困境探讨了女性的多重枷锁。剧作围绕伦敦高等法院大法官杰西卡·帕克斯展开，当致力于维护女性权益、推动司法公正的她，面临儿子哈里被控性侵的绝境时，职业准则、母性本能与价值信仰的冲突瞬间爆发，构成一道无法的人性考题。裴淳华的表演如同精密的情感仪器，将杰西卡的内心挣扎转化为可感的艺术张力：法庭上身着法袍时的威严果决，接到儿子电话后的瞬间慌乱，面对丈夫时的隐忍妥

协，独处时的焦虑崩溃，每一个细节都精准传递着女性在多重身份中的撕裂感。舞台在法庭、客厅、KTV等场景间切换，而杰西卡的身份也在法官、妻子、母亲、朋友间不断跳转，恰如剧名“Inter Alia”(除此之外)所隐喻的，女性的生活永远被“除此之外”的责任与期待填满，却往往被外界习以为常。

裴淳华对杰西卡的塑造，最动人之处在于对人性复杂性的尊重。这位看似成功的女性榜样，实则深陷结构性的性别规训：职场上需对抗男性同僚的轻视，亲密关系中需刻意弱化自身成就以维护丈夫自尊，亲子关系中背负着永无止境的母职愧疚。当儿子的性侵指控成为导火索，她内心的矛盾达到顶点——作为法官，她深知性侵案件中女性受害者的困境；作为母亲，她本能地想要保护儿子。这种撕裂让她从坚定的女性权益维护者，逐渐向固有制度“投诚”，为儿子开罪的过程，实则是她对自我信仰的痛苦背叛。裴淳华通过微表情的变化、语调的起伏与肢体语言的收缩，将这种道德困境具象化：眼神中的挣扎、指尖的颤抖、语气中的迟疑，每一个细节都让观众感受到角色内心的风暴。而剧中哈里的困境同样值得深思，缺乏男性榜样的引导、受到同辈群体的性别规训，让这个被母亲精心培养出“敏感善良”特质的少年，最终陷入暴力旋涡，展现出性别教育的深层危机。

这部作品的深刻之处，在于它没有给出简单的道德答案，而是通过杰西卡与哈里的双重困境，揭示了性别不平等的系统性根源。裴淳华的表演让观众看到，女性的挣扎从来不是个人选择的结果，而是社会结构与文化规训的合力所致。当杰西卡最终选择面对真相，哈里主动认罪时，这个理想化的结局虽带着一丝妥协，却也暗含着改变的可能——正如裴淳华在跨文化交流中所践行的，唯有直面困境、坦诚相对，才能打破偏见的壁垒。

从电影银幕到戏剧舞台，从外交场合到街头偶遇，裴淳华以多元身份构建起跨文化交流的独特图景。她的电影作品为中英文化对话提供了艺术载体，《消失的爱人》《傲慢与偏见》等影片让中国观众领略到西方叙事中的人性深度，而《三体》联合制片人的身份，更让她成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推动者。她的家庭文化实践则为民间交流提供了可借鉴的范本，证明文化认同从来不是单向的输入，而是双向的浸润与成长。《非穷尽列举》的成功放映，让这种交流达到新的高度——裴淳华的表演成为沟通的桥梁，让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在情感共鸣中相互理解。

真正的文化交流从来不是宏大的叙事建构，而是具体而微的真诚互动。她用中文名表达认同，用中文交流传递尊重，用艺术作品搭建桥梁，让中英文化在“看见彼此”中实现深度共鸣。当《非穷尽列举》的落幕灯光亮起，当外交场合的中文问候响起，这场跨越国界、跨越艺术形式的交流仍在继续。在这个充满分歧与隔阂的世界，裴淳华以演员的敏锐与文化使者的作用证明：艺术的力量在于打破偏见，而交流的真谛在于彼此尊重。正如她在剧中让杰西卡看见完整的自我，她也让我们看见，不同文明的碰撞，终将在理解与共情中绽放出温柔而坚定的光芒。

今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正式施行，阅读如何入眼人心，成为制度议题，表明其不再只关乎个人修养与兴趣，更被视为一种与社会结构、城市文化和精神生态密切相关的公共实践。

现代人常有“阅读孤独”：在高度碎片化的当下，一个人完成系统性阅读，变得越来越困难——注意力被切割，时间被挤压，在“想读”和“没空读”之间反复拉扯；即使开了个头，又极容易被打断、被拖延、被放弃……最后书就只成了书架上的存在。而上海近些年不断涌现、形色纷呈的读书会，正通过多元的方式，让更多人能真正开始阅读、继续阅读。

有人感慨，“读书破万卷”的积极意义不仅限于求知，亦更像是精神上的别处和远方，是城市生活向外伸展的另一重空间。读书会几乎可视为时代之下自发的文化回应，与阅读立法正相呼应。

2018年，一部电影《读书会》就曾讲述四位步入暮年的女性，通过读书俱乐部重新连接彼此，也重新连接自我的故事。她们在一次次共读和分享中，慢慢聊到了亲密关系、人生选择与自我认同。时至今日，电影中引以为时髦的场景俨然已在申城常态化，面貌多样的读书会正逐渐化身为都市人对抗内卷、重塑生活逻辑的方法论。

某些人选择每周固定时间的线下共读，在社区书房、小型书店或文化空间里建立长期稳定的小组；也有人偏好线上共读群，通过打卡、语音分享、视频导读来规划和完成阅读；还有人参与的是以展览、城市漫步、博物馆导览为延伸的主题型读书会……

这些读书会在形式上的差异，很大程度源于这座超级大都会本身的特质——不同方式的阅读如何与不同人的时间结构、社交需求和生活半径相互适配，其彼此的内容设计因此亦大相径庭。

比方线上读书会，早已不局限于单一的视频会议，注重与短视频拆解、有声书、播客讨论和直播导读等形式结合，令阅读获得前所未有的弹性——能见缝插针地融入通勤、午休或深夜的碎片时间，且通过共同节奏、集体承诺，化大目标为小达标，在相互激励中，将原本难以为继的阅读养成可持续的习惯。

根据不完全统计，上海市民的阅读方式已深刻数字化。仅以2024年为例，上海市民综合阅读率达97.15%，市民日均数字阅读时长接近60分钟，这为各类线上读书会提供了巨大的潜在用户池。

而无论是“5分钟读完一本书”的短视频“快餐”，还是长达数百分钟、详细分析拆解的长视频“正餐”，则由读者各取所需；以及许多人通过B站、小红书、播客平台或知识类账号，搜索和追随读书博主对著作的个人见解，再带着问题与兴趣回到原著。

今天，我们为什么仍要『读书破万卷』？

◆ 阿乙

不少线上读书会本身也是长期运作的文化社群，常与社交媒体、兴趣社群联合，利用其兴趣标签功能打造文化圈层，主张持续的互动：或每天打卡积分，或发表读书笔记，或分享金句截图，或讨论书中情节与现实生活的对应关系……阅读从“我读了什么”，变成“我们如何一起理解”。如果说线上读书会重建了阅读的时间秩序，那么线下读书会则致力于拓展阅读的空间维度——让文字在真实场景中再现，令阅读成为一种全身心的沉浸体验。

许多读书会先在线上完成预习与共读，再在线下围坐讨论，或围绕一本书发展出城市漫步、展览参观与主题行走。书友们可能在读罢一段建筑史或地方志后，集体走进梧桐区的花园弄堂，或漫步于浦江两岸的滨江线。这种“行走的书本”，使得文字与街区、空间与现实经验发生真实反应，成为溯源城市文化历史的索引。“City Read”(城市阅读)令读者转身为主动的探索者和叙事者。

城市书房、特色书店、社区文化空间、复合型咖啡书店……也都成了读书会的重要站点。阅读不再被局限在书桌与书房，却渗透日常，成为生活方式。读书会的轻社交属性，更是让阅读变成了“认识彼此的理由”——能因为同一本书、同一种兴趣集结，也更容易建立起相对真诚的关系。

至于读书会的主题也日益细分：从文学经典到心理成长，从社会议题到艺术史，从影像与文本到职业阅读……不同的小组围绕不同兴趣与人生阶段展开，书单不推崇集体共识，更像是为不同精神需求提供的多条路径。阅读成为理解自我、整理经验、拓展视野的入口。

亦如《条例》中强调要让阅读覆盖到每一个被忽略的角落。沪上读书会的多样性不仅体现在形式上，更体现在人群的关怀上：在静安、虹口等多地设立儿童友好阅读空间；而在针对白领的职工书屋，则侧重公益和疗愈；更有针对视障群体的“唱读会”，让阅读跨越了视觉的障碍。

说到底，如此形态各异的读书会，真正改变的，从不是读什么，而是如何读。读书会不是为了“帮你读完”，而是在悄然改变人与书、人与他人、人与自我的关系。

所谓内卷，无非是将人生不断压缩进单一评价体系：效率、绩效、比较、排名。在这个意义上，愈加丰富的读书会为现实提供了更丰富的解释框架——给你看到书本中的世界、他人的经验与多重视角，使人意识到，人生并不只有一条进阶道路，也不只有一种成功标准。

“破万卷”真正指向的，并不是数量，而是通过持续阅读，提供更为长期的精神回报。当阅读真正入眼人心，便能让人拥有更多维的认知结构、更宽阔的情绪空间，也可以更从容地面对未来的选择。